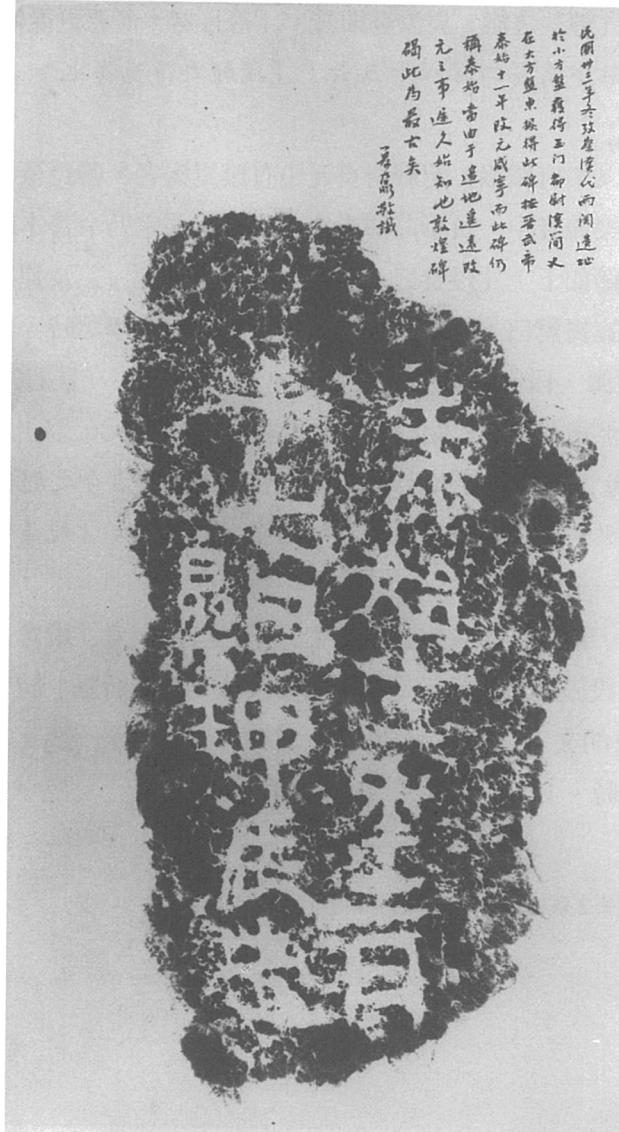


夏鼐發現敦煌漢簡和晉泰始石刻的經過



邢義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近代漢晉簡牘的發現，由洋人發其端。先是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尼雅、樓蘭發現漢晉遺簡。1930年，中國與瑞典學者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額河漢代烽燧沿線發現上萬漢簡。這是漢簡第一次大量發現，但是先發現的又是洋人－瑞典的貝格曼。傅斯年先生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基於民族感情，一心想要爭回這口氣。他推動安陽殷墟和西北考古發掘，希望透過科學考古的新手段，一方面驗證當時流行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是否如西方學者所說的那樣可信，更重要的是找尋新材料，藉以建立中國人自己的一套古史認識和解釋。

民國廿六年抗戰爆發以後，國民政府不斷內徙，中央研究院也不停向西南遷移。因沿海盡失，西南滇緬路和西北往蘇聯之路成為當時和外界聯絡的孔道；民國卅一年中，滇緬路為日軍切斷，西北成為唯一的孔道。學者和政府對這個地區的調查和研究變得格外重視。民國卅一年於是夏鼐和閻文儒的西北考古調查，卅三、卅四年又有向達、夏鼐和閻文儒的第二次調查。夏、閻這一次調查，在敦煌小方盤城北的小丘上掘獲數十枚漢簡。夏先生並從新獲簡上得到漢代玉門關位置的新證據。這一結果令他十分高興。他在給傅先生的信中說此「實史坦因氏以後第一次於敦煌獲得漢簡也」（見下文）。掘得漢簡的消息令傅斯年也極為興奮，回信讚揚夏先生為今後中國考古界希望之所寄。^①

一、1944年敦煌簡的發現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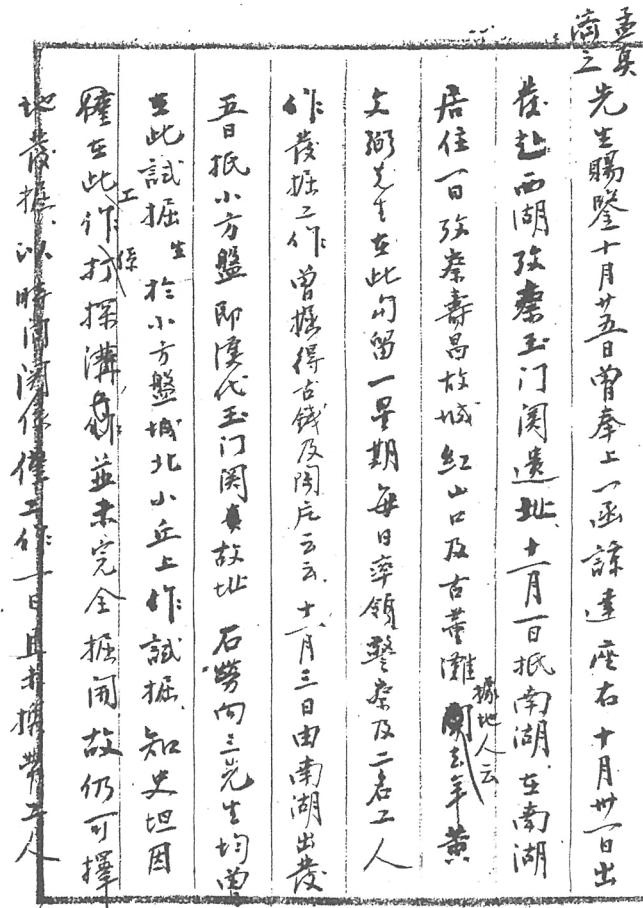
61

關於這數十枚敦煌簡發掘的經過，夏和閻先生一直沒有較詳細的報導。1947、1961年夏先生兩次發表〈新獲之敦煌漢簡〉一文，都說考察經過情形將另述於正式調查報告中。閻文儒1953年在〈文物參考資料〉和1986年在〈社會科學戰線〉先後發表〈河西考古雜記〉，無一字提及漢簡。現在兩人都已過世多年，〈夏鼐文集〉三冊已於2000年出版，文集第三度收錄同一文，仍無正式調查報告。

因此，夏先生在發現漢簡後，除了當時的日記，寫給傅斯年先生的信應該算是最早的報導了。信件自然不及考古報告詳盡。信中略提發現的經過，可稍補正式報告未出的遺憾。信中還提到一些其它的發現，這些發現和數十枚簡一樣，目前都保存在史語所倉庫。下文將先談談簡牘和晉泰始石刻的部分。

^①傅斯年對夏先生的讚美與期望可於34年2月5日傅給夏的信及2月6日給朱家驛的信中見之。前一信曾對夏說：「弟就兄之報告看，極為滿意。將來之工作，可以此為藍圖。發現書簡，尤妙。足徵此物尚多也。（已發見者當歸研究所）兄有此旅行經驗，當亦得些益處。本所考古事業之前途所望于兄者多矣」（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李38-5-8，那廉君抄件）。後一信對朱家驛說：「夏君乃本所少年有為之一人，在濟之兄領導下，將來于考古界之貢獻必大」（李38-1-17，那廉君抄件）。

民國33年11月25日，在發掘得簡後二十天，夏鼐曾寫給所長傅斯年和副所長李濟一封信，報告發掘所得（傅斯年檔案，李38-5-5，附圖1）：



附圖1

孟真、濟之先生賜鑒：十月廿五日曾奉上一函，諒達座右。十月卅一日出發赴西湖攷察玉門關遺址。十一月一日抵南湖，在南湖居住一日，攷察壽昌故城、紅山口及古董灘。據[按：原信應漏一「當」字]地人云去年黃文弼先生在此勾留一星期，每日率領警察及二名工人作發掘工作，曾掘得古錢及陶片云云。十一月三日由南湖出發，五日抵小方盤，即漢代玉門關遺址。石、勞、向三先生均曾在此試掘。生於小方盤城北小丘上作試掘，知史坦因在此工作係打探溝，並未完全掘開，故仍可擇地發掘。以時間關係，僅工作一日，且未攜帶工人，僅令護送之士兵幫忙工作，結果得有字漢簡四枚。其中一簡有「酒泉玉門都尉…

…如律令」共三行三十八字。得此經驗後，乃於他處見有希望者亦作試掘。大方盤北之第十七墩又掘得有字漢簡二十餘枚，於第廿三戊墩掘得六枚。此外尚得漢絹、苣火束、線鞋等物。又於大方盤城東南小丘上掘得一晉碑，上刻「泰始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甲辰造 樂生」十五字。敦煌碑碣此為最古矣。由大方盤而東沿漢代長城而行，途中遇雪，荒漠行帳中頗為凍冷，護送之士兵皆急欲返城，不肯發掘，故匆匆而行。十一月十一日越黨河而東，十二日抵小西梁，逾蘇勒河而北至破城子，似為清初之物，至安西屬之老捲，乃折返敦煌。十一月十五日抵縣城。旅行半月，所得雖微，然實史坦因氏以後第一次於敦煌獲得漢簡也。返城後曾赴千佛山將六朝彩繪花磚依原來樣式堆砌於第九洞中，除攜取九塊花磚運蘭外，其餘五百餘塊皆寄存千佛山藝術研究所中。此物過於笨重，無法運輸，現依原式復原，可供後人參攷。藝術研究所常書鴻所長面允，將來於一年以內，繪就彩色圖一幅以贈攷察團作報告之用。關於其餘採掘品，除一部份陶俑碎片擬寄存千佛山外，擬皆運往蘭州。西北公路局何競武局長已來電允許一公噸左右免費運蘭。連日忙於裝箱，並沖洗照相底片，大約月底以前可以東行。千佛洞於八月間發現六朝寫本六十餘卷，係工人於清末泥像中無意發現。雖為所中職員所察覺，收歸所有，然小部份為工人所藏匿，攜出私售。九月間向先生由省銀行王主任之介紹為攷察團購得六朝寫經（法華經殘卷）一卷，疑即工人所得之物。近又購得唐末五代之寫本三卷（一卷未尾書「維摩手記」，下書「張大慶」三字，當即光啓元年沙洲地志書寫人之張大慶，一卷係無量壽經三卷接成，共三百餘行，一卷有河西節度使贊詞）。此三卷為一磨坊掌櫃所藏，向先生在敦時，其人持前二卷來，索價六老石麥子。向先生離敦後，敦煌麥子驟漲。攷察團於夏初抵敦時，購麥子每老石為三千五百元至四千元，現下已漲至六千元。攷察團工作結束後尚餘有麥子數石，乃以之易換寫經。再三議價，增寫本一卷換麥子三石三斗餘。此三卷寫本向先生皆曾過目。除無量壽經為常見之物，其餘二卷向先生以為皆值得購買，臨行時且曾囑咐設法購取。敦煌寫經民間尚有收藏，但已日漸減少，佳品更不多見，故生意攷察團不妨購買數卷以作標本。向先生抵蘭州後曾來信二封，現下想已安抵李莊面陳一切。生以為此次攷察報告最好由向先生主編，尚乞 代為勸駕。其餘一切，容後再陳。此後來示，請寄蘭州科學教育館轉。耑此敬請
研安

生夏鼐敬上 廿三年十一月廿五日

信中未明說發現簡的日期，推算應是11月5日。這一點可從2002年出版的〈敦煌考古漫記〉得到證明。這本書上編是根據夏先生1955年在〈考古通訊〉創刊和二、三期上陸續發表的〈敦煌考古漫記〉以及夏先生未發表的日記，由王世民和林秀貞重新整理而成（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這書的第五章記述在敦煌發掘漢代的烽燧，完全摘自夏先生的日記。以下錄出日記中有關在小方盤城掘到最初四枚簡的經過：

11月5日，在小方盤城發掘，工作地點有二，一為城北小丘（A），由斯氏圖上I（深井）東邊向西開一探溝，深2米，長26米。據斯氏報告，曾于此間開平行探溝，獲得漢簡，惟未言其探溝之位置，大小及方向。余之掘此探溝，目的在辨清地下土層，俾確定孰種土色為斯氏之擾土，孰為原來文化層，孰為出土漢簡之文化層，孰為自然堆積之土層，以供以後發掘之參考。于井東5-13米處，離地1米以下，即有乾蘆葦甚多，40-50厘米後，文化層完結，即達地質學上之沖積土層，蘆葦中間雜以大小木片頗多，有作封檢形者。余笑謂閻君云，只要上面有字，便算是獲得漢簡了。此外3-4厘米長以蘆葦揉成之繩索亦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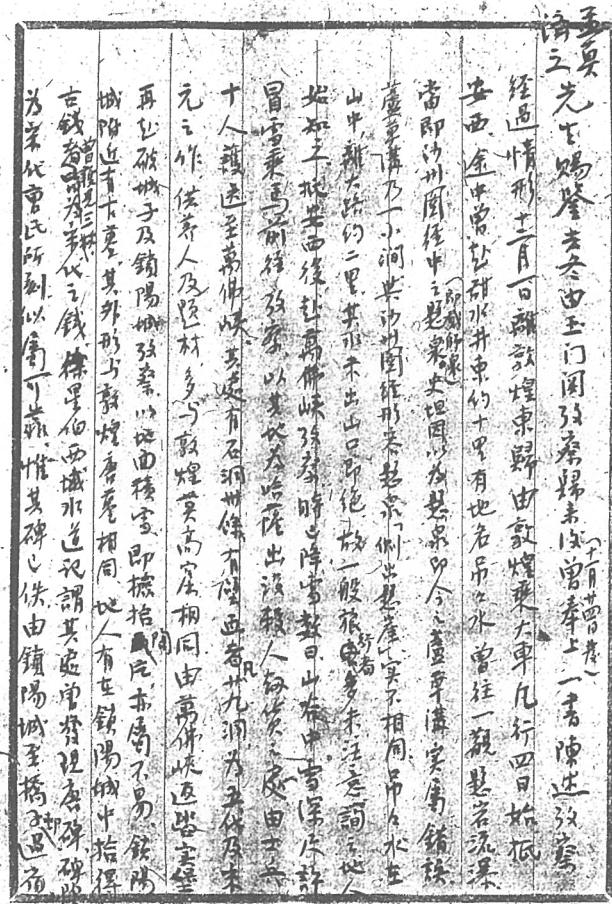
早餐後，繼續發掘，果然掘得漢一枚，係一鉢花，甚薄，蓋鉢去後再用原簡寫他事，以此間物質極缺乏也。上面行書數字「如 和元」，余等大喜。不久又得一片，字亦清楚，「子奉謁不」，大家神經越發緊張了，留心找有字的木片。後來又得一片，字數更多，余拿來一看，字共三行，有「玉門都尉」幾字。知道獲得珍品了，連忙用棉花包起來。無字的木簡亦有數片，其中一片後來細辨，似有「上郡（？）」二字，也歸入有字簡中一起收藏了。此外殘絹片頗多，間有紅色或藍色者。戈壁中發掘，四顧茫然，只有五里或十里外的古烽台，點綴其中。看起來也像近在眼前，空間觀念縮小了不少。及至發現了漢簡，用手摩挲這些漢代遺留下來的木片，恍惚間打破二千年時間的隔離，自己似乎也回到漢代去，伴了漢代的戍兵在這裡看守烽台，遠處沙塵騰起，一四騎送來故鄉家人的信牘，或京師返郡的公文。手里所持的漢簡，墨跡如新，幾令人不敢相信這是二千餘年前的東西。…今日初次發掘，以一日之力即獲四漢簡，殊為可喜。（頁103-104）

這是11月5日一天之內掘得四枚簡的經過。據日記，11月6日在大方盤城T.XVII墩附近，又得「侯官謹以□書衆候長等」、「脾一所」二簡。11月7日在T.XVII墩附近再得有字簡19片，有字而不清楚者十餘片，無字者頗多。關於出土地點和簡數，〈新獲之敦煌漢簡〉一文有較精確的數字。據此文之著錄，14墩出4枚，17墩出38枚，23戊墩出6枚，另外在17墩還出土甚多無字簡，「其中三簡尚有字畫跡痕，惟以過漫漶，無

法認識。又有細小之碎片二十餘片，僅存一字或半字，甚或僅存點畫，無法綴合，茲暫從略。」（〈考古學論文集〉，頁89-90）

幾年前，我們檢查這一批簡，發現在已發表釋文的簡之外，的確還有不少有字或字跡不全的削衣碎片。夏先生將它們黏貼在一張紙上，並在旁邊作了釋文。後來我們整理出版〈居延漢簡補編〉（台北：史語所，2000），將這些黏貼的殘片照原樣刊在圖版中，並將夏先生的釋文補刊出來。依據夏先生的原編號，共編了27號。

比較夏先生發掘當時的日記和二十天以後的信件，可以知道這二十天裡，夏先生花了不少心思，琢磨簡上的文字及有關的問題。例如，日記原僅記錄最關鍵的「玉門都尉」四字。到寫信時，已變成較詳細的「酒泉玉門都尉…如律令」等三十八字，並且顯然已對當時學界熱衷討論的玉門關址有了新見。夏先生認為玉門關就在小方盤城。民國34年1月23日夏先生在另一封給傅斯年的信中（李38-5-7，附圖2），表達了他明確的意見：



附圖2

孟真、濟之先生賜鑒：去冬由玉門關攷察歸來後，曾奉上一書（十一月廿四日發）陳述攷察經過情形。…起端之「酒泉玉門都尉」一語，不僅證明漢代玉門關之確在小方盤城（蔣委員長曾親書「玉門關」三字，侍從室曾詢問酒泉專員公署以玉門關所在，以便刻石立碑，專員無法回答），且可證明漢武河西拓土設立酒泉郡後，未劃分敦煌郡以前，即設玉門關，漢書地理志以敦煌郡有玉門陽關都尉，乃元鼎六年(111B.C.)分酒泉置敦煌後之事，沙畹氏以「以太初二年(103B.C.)李廣利還至敦煌，天子使使者遮玉門」一事而疑太初以前之玉門關在敦煌以東，勞貞一兄之近作兩關遺址攷乃進而假定太初以前之玉門關在今日玉門赤金峽，然漢武帝既已拓地至今日敦煌，何以設關隘於赤金峽，而棄置以西數百里於關外？頗疑最初所設之玉門關即已在敦煌以西之小方盤，漢武帝使使者所遮之「玉門」即玉門縣，並非玉門關。（史記大宛傳作遮玉門，漢書始添「關」字）外國人讀到Jade Gate即有玉門「關」之感，是以中國史家千餘年來對此不發生問題，一入「一字一字對譯」之外國漢學家眼中，即生此錯覺。生曾以此意與向覺明先生談及，向先生極贊同鄙見，其大著兩關小攷中即採用鄙說並加以引伸（聞不久將在真理雜志上發表，生曾拜讀其原稿）。今得此簡，可見太初二年(103B.C.)以前，敦煌未由酒泉分出以前，即已有玉門都尉駐在今日之小方盤。生對於陽關遺址，根據未發表之史料，亦頗有新意見，有暇當作一「兩關問題的新史料」以求正於當世之賢者。…

後來夏先生將他的意見正式寫成論文發表，這裡就不多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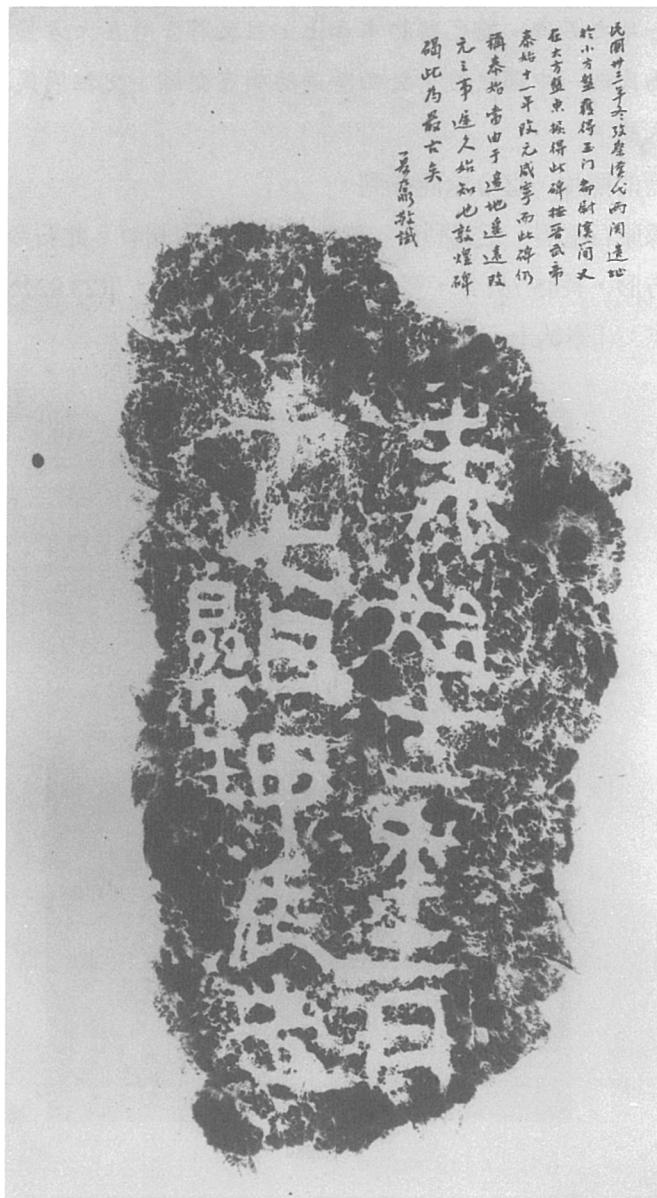
二、晉泰始十一年石刻的發現經過

以下接著談談信中提到的晉泰始十一年石刻。夏先生在11月7日的日記裡曾提到發現石刻的經過，可以和前信參看：

11月7日為此次西湖之行收穫最佳之日。上午起身後，即發掘大方盤城東南之小丘（即斯氏圖中之T.XVIII）。先在丘東之A區發掘，于B37距B34處發掘一石碑，係利用此間附近所產之紅色砂石塊，刻上十五字，「泰始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甲辰造樂生」。（頁106）

日記提到比信件更明確的出土地點。不過，日記中完全未記發現石碑後的心情。在給傅先生的信中，夏先生不禁興奮地說：「敦煌碑碣此為最古矣」。相同的心情，也明

白表露在石刻拓本的夏先生親筆題箋裡（附圖3）：



附圖3

民國卅三年冬，攷察漢代兩關遺址於小方盤，獲得玉門都尉漢簡，又在大方盤東掘得此碑。按晉武帝泰始十一年改元咸寧，而此碑仍稱泰始，當由於邊地遙遠，改元之事遲久始知也。敦煌碑碣，此為最古矣。

夏鼐敬識

這份拓本是夏先生於34年1月以前寄給傅先生的。在前引民國34年1月23日夏給傅的信中有一段說道：

泰始十一年之石碑，前已將拓本奉上，茲又將當時在大方盤所攝之照相附上，可見司馬氏統一中國之後，於西陲邊防頗有新猷，史坦因氏在樓蘭遺址亦曾發現晉代木簡。

信中所說寄給傅的照片，迄今未能找到。

現在我們據原石重照，正式刊佈，供大家參考（附圖4）。此石今呈黃褐色，形狀不規整，略呈長方形，長45.7公分，寬26.2公分，高17公分，重23.92公斤。銘文楷書，自右至左三行，作：「泰始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甲辰造/樂生」。



附圖4

「樂生」在第三行中，字較小，刻銘者應該就是這位樂生。「樂」字的寫法，將「白」的部分寫在「糸」之上，見於侯馬盟書和北魏、北齊造像題記（參〈簡牘帛書字典〉和〈碑別字新編〉），但似乎不見於隸書之簡帛。晉泰始十一年（西元275年）實為晉武帝咸寧元年。誠如夏先生所說，邊境上不知改元，仍延用舊年號，這在漢代邊塞出

土簡中也時有所見，不足爲奇。

值得注意的是發現的地點在敦煌大方盤城東南小丘，即斯坦因編號的墩十八T.XVIII。在這個地點及附近曾發現若干漢簡，其中有甘露二年的紀年（〈敦煌漢簡〉，簡2113，出土於墩十八），迄今卻未出土任何紀年明確的晉簡。這裡怎麼會孤零零地有塊有晉代年號的石刻呢？夏先生說史坦因氏在樓蘭發現晉代木簡。爲何在大方盤城未發現？據岳邦湖先生踏察，大方盤城在小方盤城東北十一公里，處於疏勒河南岸的風蝕台地上。**②**如果小方盤城如夏先生所考即玉門關之所在，又如果他論斷「司馬氏統一中國之後，於西陲邊防頗有新猷」是正確的話，這樣重要的關隘，晉代應駐有邊軍，不會放棄，否則如何連繫更深入西域，遠在樓蘭的軍隊？果真如此，這塊石刻即不可能是孤零零地存在。在這附近應有其它晉代的遺簡或遺物，或許尚未發現，或者已出土，過去未能分辨出來，而被當成漢代遺物了吧。例如，大方盤城東約二十公里外之墩XLI曾出土所謂的「仙師符」。勞榦先生即據字形及符文，斷言應爲晉或晉以後物。**③**

夏先生11月25日信中還提到許多其它的遺物，絕大部分現在都還保存在我所倉庫中。倉庫人員已整理出清單，正陸續電腦建檔中。希望以後有機會再作介紹，使前輩學者的辛勞成果不致沉埋下去。

2003/6/13

②岳邦湖，〈疏勒河流域漢代長城考察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35。

③勞榦，〈漢晉西陲木簡新考〉（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3），頁48-71。